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

陈文新　主编

中　华　书　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家“985 工程”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转型创新基地建设项目成果

目　录

我观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 邓绍基 1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主旨及特点 …… 陈文新 4
从两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价值和意义 ……〔美〕韩瑞亚 8
文学史上的丰碑 …… 卞孝萱 11
评陈文新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 霍松林 15
评陈文新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 …… 李建武 20
在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
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冯天瑜 23
时代与创新
——简论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 ……〔德〕方维规 26
《中国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 …… 鲁小俊 28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
——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 霍有明 40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探索 …… 王同舟 47
《中国文学编年史》抽样分析 …… 鲁小俊 56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
特点 …… 余来明 66
《中国文学编年史》:宗旨、方法与意义 …… 郭皓政 77

“中国文学史编写研究”笔谈
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 …… 陈平原 85
编年史:“狐狸”与“刺猬”如何共处 …… 陈文新 95
文学编年史研究的两个意义 …… 刘勇强 101
文学编年史中的纪年问题 …… 赵伯陶 108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与研究(笔谈)
编年体文学史如何建立统一性 …… 陈文新 116
作家年谱与文学编年 …… 鲁小俊 123
文学编年史编纂的三个原则 …… 赵伯陶 129
编年史: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 …… 陈文新 135
编年史刍议
——简论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体例创新 ……〔德〕方维规 142
从文献学角度看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 余来明 147

附录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及其意义 …… 徐　薇 156
《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综述 …… 郭皓政　徐　薇 159
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
出版座谈会综述 …… 汤克勤 161
《中国文学编年史》纪事 …… 165

我观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

邓绍基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大型工具书、大型总集和大型著述，不断出现，由于它们或开辟创新，或规模空前，或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具有这样那样的新面貌、新特色，所以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的重要文化成就的标志之一。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为总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就是规模空前的大型著述，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数十年来，我总是在摸索着、尝试着做一些文学史研究工作，我深知这部空前的大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重要性，深知它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我读过鲁小俊先生的抽样分析报告，我在获得该书后也翻阅过若干卷，颇有征引详博、抉择多酌之感，从而确信它是一部在深入查检文献、大量占有基本资料基础上的大型编年史，编著者还在使用基本资料时作认真的核对，并力求发掘新的文献资料，补充既有著述之不足。

“文学史”这个名称最早由国外传入，“中国文学史”这类名称的著作最早也由国外传入，与此有关，近代以来我国出现的大量文学史著作大抵相袭沿用这个名称。而编年体史书在我国却古已有之，这种传统的形式也必然在众多的文学史著作中不时出现，近二十年来数量更多，但大多是断代文学编年史。现在这部贯通古今、新旧一冶的大型文学编年史的出现，昭示着编年体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史书形式在文学史著作中开创了新局面，也就铸就了它的重要历史定位。

我国是一个十分注意历史传统和重视历史著作的国家，史学著作浩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瀚海，所以在早期的文学史写作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比如早期不少文学史著作实际是作家传记或作家小传的合编，同传统的历史著作的影响就有关系。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言中提倡文学史著作要附“年表”，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传统影响的痕迹。大致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于受到外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理论的影响，文学史家注意分期，并强调寻找文学发展的因子和文学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不仅仅满足于对作家、作品作这样那样的评价。在体例上则有分体合编（在一个朝代或历史时段内按文体论述）的“竖切”式和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横切式”。50年代以后，由于更加强调论说文学的发展，“横切”说占了上风。

通常史家论说编年体史书，总是上溯到《春秋》（当然还有《竹书纪年》）。20世纪80年代初，学人曾有一种设想，分三大块来编写文学史著作，有更接近“纪传”形式的关于作家作品的论述，有“编年”形式的文学大事记述，有便于阐述文学发展线索和规律的“史论”形式。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倡文学史著作的多样性，我说：文学史著作的多样性，也表现在形式和体例的多样性上，不同的形式和体例，都不妨尝试。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方法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探讨，更需要实践履行，要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来促进文学史著作的真正繁荣。

我当时是有感于一种承认并提倡对文学历史现象的评价可以言言人殊，却无视“实录”和“直书”的核心是要求尊重客观史实这一问题而言的；我当时也是有感于一种完全迷信某种文学史间架，把“编年史”排斥在文学史著作范围以外的现象而发的。

编年体易于见出同时期各事件之间的联系，但由于纪事前后分隔，作家的生平行事，作品的变化发展，还有一些文化现象不易详其原委，也就是说，长处和短处都很明显，在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写作中，它受到冷落或许也并不偶然。

如今这部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在继承编年体形式并自觉发挥其长处和优势的同时，还借鉴了纪传体在人物和事件叙述方面的长处和优势，也还借鉴了目前通行的贯穿着这样那样的评论的文学史著作的现代格式，

在这方面，他们设立了每一历史阶段、历史时代的引言和绪论，而这些“言”和“论”主要就是展开对文学思潮的变迁、文学流派的兴衰和其他重要文学现象的论述。为了有助于人们把握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编著者又有意识地增加了诸多思想文化内容的记述，《总序》中说得很明白：“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明显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毫无疑问，这样的设计正是适应着近代以来文学史研究的总体格局，这种“适应”实际上也使编年体文学史形式显示了一种新的“个性”。

这样，这部《中国文学编年史》实际上已不局限于传统编年体的古旧格式而有所变化乃或有所突破。如果考虑到近百年来文化风习的变异，文学史观念之更新，文学史体式之增加，这些变化当是不可避免的，古旧的体式不能框住新的变异，这是客观形势的促使，也是编著者们的自觉改进。最终又是一个古旧的编年体格式的发展变化问题。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实践中，沿用编年体这种古老体式，而又有变化和发展，这是十分可贵的尝试，也是这部《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一大收获。

（原刊《光明日报》2007 年 12 月 12 日）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主旨及特点

陈文新

《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分十八卷，依次是：第一卷（周秦卷）、第二卷（汉魏卷）、第三卷（两晋南北朝卷）、第四卷（隋唐五代卷上）、第五卷（隋唐五代卷中）、第六卷（隋唐五代卷下）、第七卷（宋辽金卷上）、第八卷（宋辽金卷中）、第九卷（宋辽金卷下）、第十卷（元代卷）、第十一卷（明前期卷）、第十二卷（明中期卷）、第十三卷（明末清初卷）、第十四卷（清前中期卷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卷下）、第十六卷（晚清卷）、第十七卷（现代卷）、第十八卷（当代卷）。每卷约 80 万字，总计 1400 万字左右。作为这一大型出版文化工程的主编，前后六年，辛苦备尝，有不少体会和收获。兹谨就《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宗旨、特点及编纂情况略作说明。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馀年，文献浩繁，作家众多，而相关成果极少。这样一种状

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

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到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

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绞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的生卒年错误，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原刊《文艺研究》2006 年第 9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两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价值和意义

〔美〕韩瑞亚

《中国文学编年史》积累的学术成就让我钦佩。我盼望仔细阅读，解决某些问题，同时发现新的研究线索。

在国外的立场

我体会到文学史的重要性是从我读研究生开始。那时哈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博士生第一年有两学期中国古典文学的必修课：第一学期是宇文所安教授教的，包括先秦到南宋，重点在诗歌和散文；第二学期是韩南教授，元代到晚清，强调小说戏曲。跟其他讨论课不一样，不要求我们分析作品，而要背很多具体的事实：作家的生卒年，重要著作的标题，文体的定义，与其他古典文学常识。作家，著作，和关键词的汉字要会写。宇文教授说，应该掌握这一切，以免到中国作研究时被同行和先辈歧视。读研究生期末报告和论文多（除了外语课外），考试少；但是这门课有很严的期末考，一百五十道题要选一百道回答。刚上研究生不久的我们非常紧张，考试前做了不少的恐惧梦（因为我已经开始关心志怪小说，同学都把他们的梦讲给我听）。到考试那天我犯了两个梦中没出现前兆的错误：一个是把诗人谢灵运的运字写成云彩的云（十多年后给孩子们起中文名字都是用一云字，说不定是这时候决定的），一个是紧张得忘了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考卷上。

这不过是笔者攻读中国文学过程中的一个笑话，但是我所受的教育，包括在美国与在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留学进修，在这方面的感受都是一致的：

文学研究思潮往往有转变(因为是倏忽变化的现实跟古代对话,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任何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对材料的详细掌握。

从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用处也许在国外比在国内更大。除了几个有名的图书馆外,国外一般学校图书馆的材料当然没有国内的全,很多学者在没有收藏中文图书的学校或其他单位工作,可能在国外比在国内更需要这种总结原材料的参考书。而且在美国教中国文学,课的范围要比在国内广。在很多学校东亚系是小系,有两三个教授负责教中国文学已经算不错,结果研究明清小说的我也要教《论语》、老庄、唐诗,甚至当代小说。要认真备好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课,这种从先秦到现代的研究著作非常可贵。

志怪小说(笔记小说)与编年史

谈编年史与明清文言小说之前,先要提出这一点:《中国文学编年史》因为对不同文体的全面关注而价值更大。有时研究诗歌的关心诗歌的发展,研究小说的注意小说的演变,虽然各种文体确有自己的系统,当时作家和读者却没把文学活动限于一类作品,不同文体之间互有影响,尤其是笔记小说跟其他文体关系复杂。明清两代文体,系统纷纭,材料丰富,本来研究小说和对明清其他文体兴趣很深的我盼望能通过《中国文学编年史》获得更全面的文学观。

谈到志怪小说,有人会以为神仙鬼怪就是超越人间,是虚构的幻想,不受时空的约束。但是我指导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读《搜神记》等的翻译本,往往强调,其故事并不是欧洲童话的模式,"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far,away...",在遥远而不确定的时代,地点模糊名字都不知的王国进行的,而是在中国国土(省,城,县,甚至街道名常常都指出)与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代(也有详细说年月的)。对这些学生而言,地名、朝代和年号也许没多大意义,但是让他们考虑为什么这类故事会写得"现实"而具体很重要。应该让他们体会志怪小说的某些特点。研究志怪小说同样不能不重视历史:在最早的传统中,怪事怪物是当或凶或吉的预兆看,就是对历史当时状

况的反映。据《西游记》第十四回，连孙悟空闹天宫也是在王莽篡汉时。干宝为“鬼之董狐”，蒲松龄自称“异史氏”，并非虚言。

神仙鬼怪各自跟人间历史和时间有不同的关系。鬼（尤其是乱世的鬼）是历史遗物；神常常是历史人物被神化的结果，还能显灵于后来的历史时代。仙是超越时间的，但是只有通过跟历史上的凡人接触才能证明这一点。志怪小说集反映了恒久的母体（反复重演的故事）与具体的历史情况之间的对立与混合。清代志怪小说家观览前人的记载，乐于提出类似的故事，进行比较。了解历史次序才能认识母体的传播和演变。

说是历史，当然是正史以外的琐屑传说、逸事和异事，有不少无关大局。跟编年史的逻辑而科学的安排相对，笔记体的特点就是杂碎，要把严格和正式的文体遗漏的东西归纳起来。但是杂碎篇什也遗留有作家的个人、家族、地方记忆与历史，而代表生活中的时间和历史意识。每则笔记小说把三个不同历史时刻连贯：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讲故事的时刻以及故事写下来和出版的时刻。清代笔记小说的主人公和故事的讲述者常常是他书有记载的历史人物（比方说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例子很多）。把各则笔记小说和整个笔记小说集描述的“小历史”跟“大历史”联起来，《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提示是不可少的。

笔者过去和目前的研究注意大作家与小作家，所以对《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宽度很赞成。最关心的时代和作者如下：万历年间（钱希言、梅鼎祚）、康熙年间（蒲松龄、张潮）、乾隆嘉庆（纪昀等）以及光绪年间（俞樾、王韬、黄均宰、刘清韵，与晚清报刊上的志怪内容）。我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是探讨笔记小说关于“乱世”的描写，把对太平天国的传说和个人记忆的描写跟对明末清初的（甚至前代的乱世）的描写进行比较。盼望《中国文学编年史》有助于我对两个材料繁复的文学时代（明末清初与晚清）的把握。

（原刊《中华读书报》2006 年 12 月 13 日）

文学史上的丰碑

卞孝萱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生前曾呼吁编著文学编年史，几十年来，只有几部断代的（如秦汉、南北朝、唐五代、元等）文学编年史问世，尚无涵盖古今之巨著。83岁的我，今见《中国文学编年史》，喜出望外。开卷有益，老眼增明。谨以一颗耄耋童心，略抒拙见。

先说结构。此书共18卷，每卷为一“时代”。卷下设章，每章为一“阶段”。“阶段”下辖年，年下辖月，月下辖日。

次言内容。此书每一“时代”、“阶段”，皆有引言、绪论，直接引用古文献。年、月、日下所录之史实，包括：(1)与文学相关的重要事件，如朝廷举行乡试、会试，颁书给各省会及府州县学，下诏修书、禁书，文字狱等；(2)作家生、卒；(3)作家的功名仕宦，如入学，中举，进士，引见，赴任，致仕，丁忧，罢职，复职等；(4)作家的行踪交游，如缔交，唱和，集会，结盟，登山临水等；(5)作品之创作刊行，如成书，刻书，进书，序跋等。

再谈方法。(1)作家的取舍。既充分关注大作家，也尽量收录小作家。不偏重诗文作家，不轻视小说戏曲作家。从实际情况取舍，明清两代小说戏曲作家之重要性，有的超过诗文作家。名列文学团体者，有传，有不传，对不传的作家，也稽考其生卒年、事迹、著述等，集中地列于有关的年、月之下。还有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而以高官提倡风雅，与当时文士诗人过从甚密，也酌情收录。据一位学者所做的抽样分析，此书收录的大小作家中，今（近）人研究成果较多者约占1/6，较少被研究者约占5/6。(2)文献的使用。既重视古文献，也注意新成果。据抽样分析，此书引用的资料中，古文献占85％左右，今（近）人研究成果占15％左右。在所引用的古文献中，未经点校

整理者占60%左右，经过点校整理者占40%左右。(3)史料的考订。目前流行的著作中，对某些作家生卒年、事迹之记载，有疏误者。还有某一作家之生卒年、事迹，各书记载歧异者。此书经过考证，对疏误者予以补充、纠正，对歧异者择善而从。(4)史事的编排。此书以公历纪年，括注中国之朝代帝王年号干支。月从农历。农历之年尾，或已入公元之下一年，予以精确计算。凡生卒年可考之作家，在其生卒年下，著录其字号、籍贯、功名、仕履等。生卒年尚难确考之作家(如某些小说戏曲作家)，采用二法：或于有关人物之生卒年月下附见，或于其人作品刊行之年月下附见作者之生平。

《中国文学编年史》结构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方法之完善，略如上述。

接着评估此书之学术价值、实用价值。

此书共18卷，每卷约80万字，全书共1400万字左右，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全书上起先秦两汉，下至当代，时间跨度长，是一部系统完整地展示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空前的大型编年史。比较各种体裁的史书，皆有不足之处，此书适当调整体例，既充分发挥编年史的长处，又尽量弥补其短处，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编著进入了新的境界。例如时代—阶段—年月日的体例，引言、绪论的设立，可以揭示文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和阶段性特征，是这部文学编年史独具的优势。此书不但大小作家兼收，而且言行并重。在特殊情况下，“言”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有些序跋、函札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也酌情收入，可以对当时的文学史进程，有更多的了解。书中对作家的文学地位，兼顾到“点”的描述和“面”的概括。例如在某一作家的卒年下，不仅收录其去世的事实，还收录同代人或后人对其作品的看法，以便了解其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博采诗话、词话、曲话以及书目提要中对作家的评论资料，是这部文学编年史显著的特色。此书直接引用古文献，以显现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不作主观论述，以避免由于视角不同而造成的历史错位。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整理、编著，对文学现象的解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理解以及作家的定位，作品的解读，都有可靠的文献为依据。对文献资料，书中经过了普查、阅读、筛选、标点而后收录，进行了去伪存真、去芜取精的考辨工作，虽细节亦不放过，以保证工具

书的准确性、可靠性。明清两代资料，浩如烟海，付出的精力尤多。从文献搜集、收录的广度和精度，反映出此书编者治学态度之严谨。有比较才能鉴别。将此书与其他文学史进行比较，便可发现此书的许多优点，例如风会之说（如“盛唐气象”、“大历诗风”）与个别、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代表作品之实际创作（如李煜列入南唐，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列入明代，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作品传播与接受等问题，一般文学史限于体例，难以妥善处理，而这部文学编年史可以依次排列，条理井然，应有尽有，不留遗憾。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呼吁：“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现在出版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其规模与成就，已大大超出陈先生生前的理想。因为：陈先生所呼吁的，只是按“时间先后，空间离合”对作家、作品进行编年，而这部文学编年史增加了三方面材料的收录，即：重要的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用编年的方式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进程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出来。

这部蕴含着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文学编年史出版后，将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能为中国文学史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由于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不但被教育部列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还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获得国家“985”项目资助。从历史意义来看，誉此书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是当之无愧的。

在这篇书评的最后，我提出如下建议：中国古代杰出的作家，兼擅诗、书、画，被称为“三绝”。不擅长书、画的作家，大多与书画家有交往。书画家笔下的精美的艺术品，激发了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创作热情，拓展了作品的表现能力和题材内容，千百年中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赞颂书画的诗文。题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